

国父思想与近代学术

程天放 主编

正中书局

國父思想與近代學術

主編者程天放

桂崇基 羅時實

謝徵孚

編著者

孫邦正 崔載陽

正中書局印行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版初臺月一十年四十五國民華中

版二臺月二年四十六國民華中

術學代近與想思父國

角三元六裝平 價定本基 冊一全
角二元八裝精

(費滙費運加酌埠外)

放	天	程	者編主
實	時	羅基崇	桂
	孚	徵謝	者著編
陽	載	崔正邦	孫
譽		元	黎
局	書	中	正
			刷印行發

號三巷一街安泰市北臺

司公書圖成集 銷經總外海

(號七街海北地麻油龍九港香)

店書風海

(地番六五目丁一町保神田神區田代千都京東本日)

店書海東

(地番八九町前門中田區京左市都京本日)

維(4854)號九九一〇第字業臺版局 證記登業事版出局聞新
(1000)

前

言

前言

程天放

國家是由個人集合而成的，國家一切現象，決不能脫離人的因素。因此，一個國家的革命事業，必須要有偉大的領袖出來領導，才能成功。這種革命領袖使得國家亡而復存，危而復安，或者是由殖民地創造一個新的國家，就會受整個民族所崇拜，尊稱他為國父。近代史上有三個顯著的例子，第一個是領導北美十三州抗英獨立的華盛頓，被尊為美利堅合眾國之父。第二個是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二百六十多年滿清統治和二千多年專制政體的孫中山先生，被尊為中華民國之父。第三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土耳其危如累卵的時候，領導土耳其人民起來抵抗英、希聯軍，建立土耳其共和國的基瑪爾，被尊為土耳其之父。

這三位國父在本國都受到熱烈的崇拜，在國外都受到普遍的尊敬，可是中國的國父和美國或土耳其的國父有一點不同。華盛頓、基瑪爾，都是革命領袖，對國家有偉大的功勳，而中山先生則除了是革命領袖，對國家有偉大的功勳外，還是一個大思想家、大學問家，對於世界學術有很大的貢獻。

國父天資聰穎，有超於常人的分析力和判斷力，再加上他一生沒有嗜好，除了從事革命工作外，就是讀書，他一方面研究中國傳統的思想和制度，另一方面研究西洋的思想和制

度，將這兩類學問融會貫通，再加上他深思熟慮所得到的創見，就完成一套有系統有條理的思想，在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上放出燦爛的光芒。以一個從事實際工作的革命領袖，而能在學術方面有這樣大的成就，這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

國父誕生前七年，英國的博物學家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出版了他不朽的巨著物種由來（Origin of Species）。他積了二十多年辛勤的研究，才確立了進化論的科學根據，在宇宙萬物生存競爭中，能夠適應環境的才可以保存下來，不能適應環境的就要受淘汰，我們所見的鳥、獸、蟲、魚、花、草、樹木都是經過數十萬年乃至數百萬年的進化而來，並不是一有宇宙就是如此的。許多幾百萬年乃至幾十萬年前的生物早已滅亡，而新的生物却繼續不斷的產生，才造成今天這個世界。因此達爾文就由研究生物的變化而得到一個進化的定律，就是優勝劣敗。達爾文的著作一出，震動了歐洲的學術界，當然守舊分子，尤其教會人士都反對達爾文，可是真理一經發現，是無法遏阻的，所以進化論風靡世界，一切學術思想都受它的影響而改觀。

達爾文的進化論，本來是學術上一個大進步，是天經地義無可懷疑的事，不幸達爾文以後的進化論者，將優勝劣敗的道理應用到人與人的關係，和國與國的關係上去，那就發生極大的流弊。人與人、國與國之間，既然優勝劣敗，那末強國吞併弱國，歐洲人壓迫亞非各民

族，資本案剝削勞動階級，正如老虎吃豬羊，大魚吞小魚一樣，成為理所當然的事，世界上許多慘禍，許多苦痛，就由這造成了。因為進化論有了流弊，所以俄國學者克魯泡特金 (Peter A Kropotkin) 就在一九〇二年出版互助、進化的一個因素 (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 強調互助在進化過程裏所發生的作用，來補達爾文學說的不足。

國父並不是專攻生物學的人，可是他對達爾文和克魯泡特金都曾有深刻的研究。他將進化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是物質進化時期。「元始之時，太極動而生電子，電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質，物質聚而成地球」，這個時期，根本沒有生命，談不到競爭或互助。第二時期是物種進化時期。由生元開始，「物種由微而顯，由簡而繁，本物競天擇之原則，經幾許優勝劣敗，生存淘汰，新陳代謝，千百萬年而人類乃成」。第三是人類進化時期。「人類初出之時，亦與禽獸無異，再經幾許萬年之進化，而始長成人性，而人類之進化於是乎起源。此期之進化原則，則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他對達爾文的競爭說和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說都給了一個正確的評價。競爭說適用於物種，到今天還是如此，不適宜的生物還是會被淘汰，互助說則適用於人類，然後才可以避免剝削、壓迫、戰爭的痛苦，使人類幸福蒸蒸日上。

國父誕生後一年，猶太種的德國人馬克斯（Heinrich Karl Marx）經過了二十多年研究，對經濟問題的研究，出版了資本論（Capital），共產主義就由此建立起來。馬克斯最重要的理論是唯物史觀。他認為世界是隨物質轉移的，物質改變了，世界也就隨着改變，社會上一切組織，一切制度，莫不受物質，也就是生產方式的支配，不但法律、政治、經濟如此，乃至於道德、哲學、文學、藝術也是如此，因此物質成為歷史的重心。他另外一個理論是階級鬥爭。馬克斯認為人類一部歷史就是階級鬥爭史，古代有主人和奴隸的鬥爭，有地主和農奴的鬥爭，有貴族和平民的鬥爭，到了工業時代，就有資本家和工人的鬥爭，綜合言之，就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如果沒有階級鬥爭，就不會有社會進化。他的第三個理論是剩餘價值。馬克斯講一切生產都是由勞力而來，可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所得的工資只等於他所生產的價值一部分，另一部分，就被資本家拿去了，這就是所謂剩餘價值。因為資本家剝削工人應得的權利，而造成他的財富，所以就引起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階級鬥爭。這三項理論合起來，就成為馬克斯的整套學說。

馬克斯的學說一出，不僅建立了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學派，而且影響到整個人類的政治活動、經濟活動。馬克斯以前的社會主義各學派，也反對資本主義，也主張消滅資產階級，可是它們都採溫和的改革方法，逐漸達到目的，只有馬克斯鼓吹階級鬥爭，主張不擇手段來奪

取政權，然後以最慘酷的屠殺行為，來剷除一切資本家，乃至中產階級。一九一七年馬克斯的俄國信徒，利用俄皇室的崩潰，在俄國建立了共產主義政權，有了這個根據地，他們就用顛覆、滲透的方式，將共產主義推廣到全世界去。國父青年時遊歷歐美各國，已經發現資本主義所造成貧富懸殊的痛苦，他知道中國不但要解決民族問題、政治問題，而且要解決社會問題，以免蹈歐美各國的覆轍，因此他反對資本主義。但是他研究馬克斯的學說，也發現許多缺點。他批評馬克斯的剩餘價值說講：「所有工業生產的盈餘價值（就是剩餘價值），不僅是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有能力的分子，無論是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或者是在消費方面，都有多少貢獻」。他又批評馬克斯的階級鬥爭講：「資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增加工人的生產力，工人有了大生產力，便為資本家多生產，在資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生產，在工人一方面可以多得工資，這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調和，不是相衝突，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

國父更進一步批評唯物史觀說：「社會上大多數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就是因為要解決人類生存問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

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馬克斯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中又以生存問題為重心，那才是合理。」因此 國父的結論是：「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是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質。」（以上所引都見民生主義第一講）

國父對十九世紀的兩大學說，一個達爾文的進化論，一個馬克斯的唯物史觀，都指出它們的錯誤，糾正他們的偏差，這已經是學術上很大的成就了。可是 國父對近代學術的貢獻，還不止於此，他在政治、經濟、教育、社會、哲學各方面，都有獨到的見解，或創立的制度，我在此只能做一個扼要的敘述。

國父實行革命目的就是要救中國，一方面要推翻滿清的統治，另一方面又要消除列強的壓迫，使中國達到國際上自由平等的地步。怎麼樣才能做到呢？那就要恢復中國的民族精神也就是民族主義。而要恢復民族精神，首先要恢復中國固有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各種道德；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做起，直到治國平天下這一套政治哲學；和發明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那種能力；然後迎頭趕上歐美的科學。可是中國恢復了民族精神，強盛了之後，很可能走上列強帝國主義的道路，那就不是世界之福，所以 國父講中國要決定「濟弱扶傾」的責任。換句話講， 國父的民族主義，不但要使中華民族

完全獨立，而且要幫助其他受壓迫的民族也取得獨立的地位，世界就可達到大同之治。

國父對於政治創立了好幾種新的制度，第一他感覺在近代民權發達的國家，人民有一種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有一種萬能政府為人民謀幸福，另外一方面又怕有一個萬能政府，人民就沒有方法去控制它。國父對這個問題，專心研究後，就發明了權能區分制，將權與

能——也叫做政權和治權——分開，政權在人民手裏，治權在政府手裏。政府有治權可以為人民謀幸福，但是人民有政權，如果政府不聽人民的話，就可以改變政府，換過一批人來替人民辦事。正如一個股份公司，股東有權，而總經理有能，總經理是替股東服務的，他做得好，股東就信任他，讓他有全權做事，他做得不好，股東就可以去掉他另用一個總經理。

歐美各民主國家人民，不是沒有政權，而是政權不充分，它們普遍實行的只有一種選舉權，由人民選舉議員，選舉官吏，國父講：「專行這一個民權好比是最初次的舊機器，只有把機器推到前進的力，沒有拉回來的力。」（民權主義第六講）他主張在選舉權之外，要加上罷免、創制、複決三種權，人民有了這四種權，才算有充分的政權，才能控制政府，使得它不敢違背人民的意旨。歐美各國的政府也不是沒有治權，而是治權不完全，例如美國政府，只有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分別由總統、國會、和法院行使。中國專制時代，君權高於一切，可是監察和考試兩種權却是獨立的。國父認為一個萬能政府，應該在美國行政、立

法、司法三權之外，再加上考試、監察兩權，分別由五個院來行使，成為五權憲法。這樣，以人民的四種政權來控制政府的五種治權，有一個萬能的政府，為人民謀幸福，而人民可以有效地控制它，這當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

國父是一個實行家，他深深知道，權能區分的理想，不是一蹴可幾，尤其中國人民在專制政體下，過了幾千年的生活，絲毫沒有民權的經驗，一旦要他們行使四種政權，是無法運用得當的。因此，他不僅創造一種新的制度，而且發明了一種新的程序，來推行這種制度。國父在民國六年，寫了一部民權初步，讓一般人民練習如何集會，如何議事，以養成民主政治的習慣。到民國十三年制定「建國大綱」，將建國的工作分做三個階段。第一是軍政時期，在這個時期由政府用兵力掃除障礙，例如軍閥和反民主的惡勢力等。第二是訓政時期，在一省完全底定後，軍政就停止，而開始訓政，就是由政府協助人民籌備自治，一個縣做到人口調查清楚、土地測量完竣、警衛辦理妥善、道路修築成功，人民又受了四權使用的訓練，才算是完全自治之縣，人民才能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政權。第三是憲政時期，一省全數之縣都達到完全自治的程度，那一省才算憲政開始。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到憲政開始時期，政府才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依憲法行全國大選舉，產生民選政府，建國才算完成。

水要有源，才能長流而不涸，木要有根，才能長榮而不枯。政治的道理也是一樣，民權也必須有根源，才能持久，才能發揚光大。沒有根源的民權，那就同法國大革命時暴民政治一樣，一時間轟轟烈烈，沒有多久，就恢復專制了。國父講民權要實行訓政，就是要為民權奠立根源。一個長期受專制或外國統治的國家，如果要實行民主憲政，必須經過訓政這個階段，使得人民接受四權行使的訓練，能夠切實推行地方自治，民權才算有了基礎，否則驟然施行憲政，必然會成為非驢非馬的局面。我們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亞洲非洲許多新興國家，都頒佈憲法，實行民主政治，可是它們過去受歐洲人的統治，毫無政治經驗，取得獨立後，又沒有經過地方自治的訓練，人民一旦得到政權簡直不知道如何使用，野心家就利用機會出來操縱，共產黨也推行滲透顛覆，結果，往往一獨立，就造成紊亂的局面。假如它們接受國父建國的程序，經過一個訓政時期，我相信這種紊亂就可以避免了。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國父所創設的政治制度和施行程序，在現代政治學上面，是一個輝煌的貢獻。

在經濟方面，國父也不僅推翻了馬克斯的唯物史觀，而且研究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來解決民生問題，預防社會革命。社會上所以造成貧富不均的現象，主要有兩個因素，一個是土地，一個是資本，要解決民生問題，也就是要解決土地和資本的問題。共產主義主張土地和資本都從私人手裏收歸國家所有。國父不贊成這種極端辦法，而提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

兩個綱領出來。平均地權，是由地主自行申報他所有土地的價值，政府則照所報價值收稅，並可隨時收買。報價以後的土地，因為政治改良，社會進步，價值增高後，所漲的價，就歸公有，而不屬於原來的地主。這種辦法，既不採用沒收方式，使地主吃虧，也可以避免因地價高漲而造成不勞而獲的暴發戶。節制資本則包括節制私人資本，和發達國家資本。一切日用必需品任由私人生產，可是大規模的礦產和鋼鐵、汽油、鐵路、造船，等重工業，以及郵政、電報、電燈、電話、自來水、煤氣等公用事業，都歸公家經營，以免私人壟斷。政府的資本不夠，則可借外資來辦理，國父並且訂出很詳細的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的「實業計劃」。國父這一套辦法，就是要使產業發展的結果，歸全國人民共同享受，而不致造成少數大資本家，發生貧富不均、苦樂懸殊的現象，這種思慮預防的方法，比到已經發生了毛病再來醫治自然更好。

關於社會和教育方面，國父首先昭示我們，真平等和假平等的區別，在專制時代，社會上有帝王、貴族、人民等階級，是一種不平等的社會，人民受到壓迫，非常苦痛，贊成革命的學者就創天賦人權說，講人是生而平等，不平的制度是不合理的，應該打倒，結果就產生十八世紀末年法國大革命，和十九世紀歐洲其他國家的革命。革命以後，帝王貴族等特權階級都消滅了，可是社會上却產生了假平等的現象，那就是不論一個人的天賦智力如何，都壓

在一條水平線下面，成了平頭的平等。聖、賢、才、智與平、庸、愚、劣的人，受到同樣的限制，不能進步，這正如身高六呎的人，要他蹲下去和身高五呎的人看齊，一樣地不合理。國父所主張的平等，則是大家站在一條線上，立足點平等了，然後各憑自己天賦的聰明才力，去向上發展，能夠發展到多少高度，就是多少高度，這樣才是真平等。

國父將人類按照天賦分做三種，「有先知先覺者，有後知後覺者，有不知不覺者，先知先覺者為發明家，後知後覺者為宣傳家，不知不覺者為實行家，此三種人互相為用協力進行，則人類之文明進步必能一日千里」。這和孔子所講「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的道理，是符合的。先知先覺者就是孔子所謂上智，不知不覺者就是孔子所謂下愚，後知後覺者則是常人了。有了這三種人，假如先知先覺者，或者後知後覺者，用他們的聰明才力去壓迫不知不覺者，那末這種才力不但對國家社會沒有益處，反而有害。因此國父為補救這個缺點就提倡服務的人生觀。他主張「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而不以奪取為目的」。聰明才力大的人可以為千萬人服務，造千萬人的福，聰明才力較小的人則為十百人服務造十百人之福。這樣一來，雖然天生人類的聰明才力不平等，然而服務的道德心發達，聰明愈大，才力愈強的所服務的範圍也愈廣，這樣的社會，才是真正平等的社會（見民權主義第三講）。

人類天賦的聰明才力既然是不平等的，社會就應該給予每個人和旁人同等的機會，去發

展他的聰明才力，這便是立足點的平等，也是真平等。這種同等機會，就是受教育機會均等。因此，國父主張男女兒童都有受教育的權利，一切學費、書籍，乃至衣食，都由公家供給，由幼稚園、小學、中學、直至大學（見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這樣，即使最窮苦家庭的子女，也同樣有受教育的機會，而且只要他或她天賦很高，都可以接受大學教育，發揮他或她的聰明才力，來服務國家，造福社會。

國父生平最服膺的是孔子大同思想，所以他的理想，就是要建設一個，「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社會。他在民國十三年制定建國大綱時，對此點就有規定。建國大綱第十一條講：「土地之歲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鑛產水力之利，皆為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育幼、養老、濟貧、救災、醫病、與夫種種公共之需」。國父這種思想，與歐美各國在一次戰後所採取的社會安全措施完全符合。

國父關於政治、經濟、教育、社會各方面的學說，都有哲學觀念做基礎，他的哲學觀念可以分做兩部分來講。第一、他研究推翻滿清的革命破壞告成，而創立民國的革命建設却失敗的原因，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一般同志受傳說對武丁所講「非知之難，行之維難」那句話的影響。他們認為國父的理想太高，抱負太大，是不能實現的，因此，革命建設就無

法完成。

國父在失敗以後，潛心研究幾年，才發現行易知難的道理，民國七年他寫孫文學說，用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築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十件事來證明行易知難。

國父所以提倡行易知難，並不是教一般人只注重求知，而不注重實行。相反地，他是要鼓勵一般人去努力實行，不要畏難苟安，先存了失敗的心理。國父將人類進化分做三時期。「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為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為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後，為知而後行之時期。」（孫文學說第五章）他的結論是，不知亦能行，能知必能行。人類進化以不知而行為必要的門徑，習練、試驗、探索、冒險，是文明的動機，而四者都是行其所不知以達致知，或建功立業的目的。到了科學昌明時代「凡能從知識而構成意象，從意象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劃，按計劃而用工夫，則無論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無不指日可以樂成」。（孫文學說第六章）國父這種學說完全以實踐為目標，可以稱為力行哲學。

關於心靈和物質的關係，世界分成兩大派哲學，一派是唯心論者，一派是唯物論者。唯心論可以佛學做代表，佛家認為境由心造，一切物質現象，都是人類心裏的幻想，根本不存在，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唯物論自然以馬克斯的學說集大成，馬克斯認為歷史的